

# 印度中產階級透視

● 張春明

1947年8月14日晚，印度結束了長達兩個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尼赫魯用英文發表講話：「一個不幸的時代今日宣告結束，印度重新發現了自己。」為甚麼尼赫魯在如此有紀念意義的講話不是使用本民族語言而使用英語？特別是尼赫魯畢生反對英國殖民統治，這不由得讓人咀嚼起印度中產階級的特性來。

在1991年8月至9月，拉奧(P. V. Narasimha Rao)政府着手改革印度經濟，對外開放和吸引外商投資，印度的中產階級開始了新的發展，而且更為印度國內外矚目。關於這個階層的規模、它的消費模式的研究與爭論促成了連篇累牘的文章、報告。迅速壯大的中產階級也激發了印度人對國家前途的美好想像，中產階級對印度經濟的貢獻，使它進入「輝煌印度」(Shining India)時代，同時作為擁有近三億人的消費市場，由中產階級組成的城市印度被新經濟政策的提出者稱為「世界第三大國」，成為印度吸引國外資本的重要砝碼。顯然，人們對這個階級變戲法般的變化所產生的欣慰，是基於它作為前衛的消費者而出現的。全面考察它在印度獨立後的發展過程，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階級及其對印度未來的影響。

## 一 獨立後的中產階級， 脫胎卻沒有褪色

1947年8月14日晚，印度結束了長達兩個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發表講話：「許

多年前，我們和命運有個約會，現在是時候實現了……，一個不幸的時代今日宣告結束，印度重新發現了自己。」<sup>①</sup>但他華麗的辭藻並沒有打動全國各地歡呼的民眾，因為要領會他的意思必須能聽懂他的英文演講，而且要有財力擁有收音機。為甚麼尼赫魯在如此有紀念意義的講話中使用英語？而此語言總讓印度人聯想起與他們有着完全不同又難以理解的生活方式的外來統治者，特別是這個殖民統治還是尼赫魯畢生反對的，這不由得讓人咀嚼起印度中產階級的特性來。

由於在英國統治下形成的上等階級、中產階級與印度社會其他階層的天塹，以及他們在民族自由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新印度政府基本保持了英國統治下的各種制度。在所謂政權印度化的過程中，新政府首腦搬進英國人留下的豪華官邸，為尼赫魯們嚴厲批評的公共服務還在延續，法院、軍隊幾乎還是按英國的套路運行，有區分社會等級之用的英語仍然是官方語言，是中產階級社會進階的護身符。

在走向獨立的年代，中產階級利用民主制度引導印度人民反對外國統治的高昂熱情，獨立後民主制度卻又與民眾隔絕。政權把持在少數人手

中，中產階級受上等階層的支配。獨立時的中產階級數量極少，在3.5億人口中僅佔一千萬，其主要成員為政府官員、商業經理、中等水平農民、知識份子如醫生、工程師、老師、大城市學校和高校教師、記者等<sup>②</sup>。

高等教育把印度的精英聯結在一起，打開他們通向中產階級之門，也把他們與其他階層分割開來。他們受到專門教育，還有人到英國接受更好的教育，所有中產階級都使用英語而不是本民族語言。把中產階級和其他階層區分開來的另一個標準是收入，年收入在1,200盧比到12,000盧比是進入中產階級的金錢指標。除了收入，更重要的使印度中產階級保持一致性的因素是他們的人生目標和對國家的態度。

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中產階級是平和、審慎和穩定的，最好的政體是由中產階級組成的，中產階級不像窮人那樣覬覦垂涎鄰居的財產。市民擁有中等的財產會使政府變得更好，數目龐大的中產階級就像壓艙石那樣使社會穩定。

但是在印度，多年來，中產階級享受了與其規模不相稱的權利和影響，僅僅在獨立後的幾年是不是形成了亞里士多德所期望的有社會道德、自我約束和理想主義的中產階級？我們應該從印度獨立後中產階級的不同行為來加以分析，在敵對殖民者被驅逐後，他們需要找到理想的停泊處，實現他們的新目標。中產階級意識到，要重新建設國家和社會，就必須解決貧窮問題，他們信服崇拜甘地(Mohandas Gandhi)，但難以接受甘地回歸簡陋生活和返回自給自足社會的觀念，而在此時，尼赫魯增強國力、抵禦外來壓力的思想就激發了中產階級建設印度的激情。

擁有建設自己國家的熱情，加上

備受尊重的領袖尼赫魯掌權，印度中產階級不再搖擺不定，致力於投身國家建設。印度在第三世界中的率先獨立，以及印度文化在世界的影響，激發了中產階級強烈的大國使命感，尼赫魯曾這樣闡述道：「印度以它現有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銷聲匿迹，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中間地位是可能的。」<sup>③</sup> 1951年之後的十年中，印度人均收入每年增長2%，高於人口的增長速度。沒有了衝突紛爭，一切按部就班，蛋糕在漸漸被做大，印度進入了民族復興的第一個好時期。

## 二 改革之前中產階級的內部鬥爭和政治參與

在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執政時期，印度中產階級의思想和行為一度趨向保守，表現為他們對政治參與的冷漠和向傳統印度教的回歸。印度中產階級回到安於現狀、沒有欲望、沒有激情的普通人生活狀態，他們對國家社會的長遠關懷蕩然無存，保護自己的利益，爭取更大收益成為中產階級政治參與的唯一目的。

在1990年前，傳統的上層和中產階級精英充分利用政治和社會地位上的優勢，讓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獲得掌握權利的技能，利用自己的社會資源，保持在政府和管理部門的支配地位。得益階層得到過多的利益，精英希望自己永遠是精英，剛性僵化的體制使他們沒有遇到挑戰，任何其他階層對這些權利的要求和垂涎都被排擠壓制，一直如此美好的現實讓他們忘記了個人品德和社會道德應該作為求學和求職的標準之一。

印度在第三世界中的率先獨立，激發了中產階級強烈的大國使命感，尼赫魯曾說過：印度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銷聲匿迹。尼赫魯增強國力、抵禦外來壓力的思想激發了中產階級建設印度的激情。1951年之後的十年中，印度人均收入每年增長2%，進入了民族復興的第一個好時期。

1989年辛格接任總理，決定實行《孟德爾報告》，把政權從上中層集團的精英手中轉移，中產階級內部的爭權奪利演變為爭取政治平等和社會公正的政治風波。脫離草根社會的城市中產階級，忽視了印度社會還存在着化石般的階層差異與隔閡。印度人真正遇到的難題是貧苦、文盲、疾病和剝削等社會問題。

1989年辛格 (Vishwanath Pratap Singh) 接替拉吉夫·甘地 (Rajiv Gandhi) 擔任總理，因為與各利益團體的妥協，他決定實行《孟德爾報告》<sup>④</sup>。《孟德爾報告》改變了印度的政治規則，把政權從上中層集團的精英手中轉移。這種做法打破了既得利益者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權利連續性，因而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同時，邊遠地區的農村中產階級要求重新分配土地，修訂法律保護他們的財富。他們分享政治利益蛋糕的舉動引起了從英國統治時期就享有特權的利益集團的不安，中產階級內部的爭權奪利演變為爭取政治平等和社會公正的政治風波。

脫離草根社會的城市中產階級在很長時間內混淆了理論與現實，忽視了印度社會還存在着化石般的階層差異與隔閡。但是把持政權的既得利益集團的自私還是讓他們無比震驚，並由震驚化為憤怒，繼而變成行動挑戰這個體系。作為中產階級後備力量的城市大學生成為這次活動的主角，街頭到處是抗議不道德政治權利的學生，大學生自焚、被逮捕的新聞充斥電視和報紙。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鼓吹社會公正的《孟德爾報告》的得益者並沒有從心底徹底認同社會公平這個信念，新富新貴在政治鬥爭中實現了自己的目標，但窮不聊生的農民、被壓迫的下等階層照舊過着沒有公正的生活。

剝開這次政治鬥爭社會公正的外衣，《孟德爾報告》事件的本質是中產階級為爭取政府資源而進行的內部鬥爭，倡導它的人用品德代替出身來打擊獲得排他權利的傳統精英，他們得到了自己階層的狹隘利益。如果說中產階級列車上的老乘客的社會理想主義已經死亡，那麼從事件的結果我們還可以看到，新乘客更是沒有一丁點這種意識，後者一直渴望中產階級

的地位與生活方式，一旦他們通過「社會公正」之類的腳手架獲得了這些，冠冕堂皇的藉口便被拋到九霄雲外了，美好的目標被赤裸裸的手段所取代。

因此，當印度的新老中產階級脫下道德外衣時，獨立運動中中產階級的理想主義信念便被擊得粉碎，印度社會中呈現的顯而易見的結果是：一、有效的社會公正目標被有漂亮口才的犬儒主義者征服。二、中產以上的階層意識變得次要，而階級關係分外緊張，印度人真正遇到的難題是貧苦、文盲、疾病和剝削等社會問題。

### 三 物質時代的中產階級生活

失去理想的印度中產階級不再對形而上的精神寄託孜孜以求，他們回歸安逸單調的日子。經濟的發展刺激了他們的物質欲望，展開了對奢華生活的不懈競逐，中產階級愈來愈明顯地暴露出這些集體神經症。

80年代的農業持續增產，在農村的通電、通路促進了交通、建造和製造業的發展，提高了生產力。過去印度人會批量地購買散裝的無牌貨物，肥皂、茶葉按斤賣，布按尺量，現在他們願意多花錢購買他們認為質量更好的包裝商品。富有的城市人對錄像機、洗衣機、汽車等消費品趨之若鶩<sup>⑤</sup>。印度中產階級最明顯的特徵是物質的成功，多年來他們一直沒有消費，現在他們有錢消費，願意購買品質好的商品，在日常耐用品的消費上他們比上一代多得多，但也跌進了擁有愈多，欲望愈多的溝壑。

在家庭方面，中產階級家庭的平和安詳遭到無法調和的挑戰，在

1984年和1994年所做的調查顯示，十年間自殺而死的人數翻了一番，而自殺不遂者的人數是自殺身亡者的十倍；離婚率不斷上升<sup>⑥</sup>；心血管疾病、哮喘、癌症等與心理壓力有關的疾病變得普遍。這個影響是全方位的，從家庭結構到家庭成員，從老到少，從男到女。

在教育方面，中產階級對利益的競爭追逐是「近視」的，但在應付競爭的準備上卻又是「遠視」的。為了長遠考慮，在人口眾多的印度，中產階級開始重視起人口質量來，優生優育得到空前強調。在孩子剛學會走路、剛能數數時，父母對他們的人生計劃就已經開始。在學校的表現是重要的，要上好的大學就需要九十分以上的好成績，使得孩子們的學校像父母的職場一樣競爭激烈。中產階級的下一代就這樣在沒有盡情娛樂、充滿焦慮的童年生活中被複製。

在教育投資上，中產階級利用自己在政治、經濟上的影響力，促使政府增加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最終使自己獲益<sup>⑦</sup>。1950年時，印度高校在校生只有17.4萬人，到1960年達到55.7萬人，而1970年已發展到195.6萬人，年增長率高達12.86%。許多專家認為，這種高速增長是與政府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分不開的（高教開支佔整個公共教育開支的比重，從50年代的15%增至60年代末的25%）<sup>⑧</sup>。

年輕人更有錢，而且他們需要通過購物表現出來。整個經濟的充分發展使他們接受了消費至上文化，擁有自己的住房、閃亮的汽車和時尚的筆記本電腦。新中產階級擺脫了崇尚甘地精神的前輩們的節儉，在孟買和德里的豪華購物中心，消費者貪婪地搶購物品，從手機到家庭影院、從法國香水到珠寶，不一而足<sup>⑨</sup>。

中產階級在物質社會的全部活動過程就是刺激和鼓勵無限度的消費生活，而公民社會需要養育的品德卻沒有得到關注。中產階級的自私、孤獨和無情在消費時代極度膨脹，他們追求更多物質、更高位置的工作動機，卻使必要的公共生活受到抑制。在個人方面，工作佔據了他們多數時間，壓力又寸步不離，使他們失去了健康。有人按照GDP（國民生產總值）提出GDH（國民愉悅總值，Gross Domestic Happiness）也應該是富裕社會的重要標準，但顯然，對中產階級來說，GDP日益優厚，而GDH卻今不如昔。經濟成功與內心滿足的溝裂在中產階級中擴大。

值得一提的是，中產階級家庭不多的嗜好之一就是看電影。載歌載舞、不着現實的印度電影，重複着主人公從一無所有到殷實奢富的傳奇故事，成為他們逃避現實的壓力和挫折的世外桃源<sup>⑩</sup>，為他們延續中產階級之夢提供興奮劑。

印度前能源部長薩蒂（Vasnat Sathe）這樣描述80年代的印度：「我們不能不看到這個事實：增長與發展僅僅限於印度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我們事實上在貧困的汪洋大海中建造了一個繁榮的小島，在這個小島上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擁有現代文明所有的一切福利。」<sup>⑪</sup>

#### 四 經濟改革後中產階級的發展與反省

1991年下半年印度開始經濟改革，促進國家經濟全球化。聚光燈再一次照在中產階級身上，因為它有着超乎想像的消費能力。它的規模、消費潛力被鄭重其事地度量着。這項工

印度中產階級最明顯的特徵是物質的成功，他們的全部活動就是刺激和鼓勵無限度的消費生活，而公民社會需要養育的品德卻沒有得到關注。中產階級的自私、孤獨和無情在消費時代極度膨脹，他們追求更多物質、更高位置的工作動機，卻使必要的公共生活受到抑制。

作對印度政府來說很重要，因為它希望向發達國家展示自己未被開墾的市場。而對於發達國家而言，販賣它們的商品和技術的熱情，也促使它們對印度中產階級興致盎然。

有幾個因素使中產階級突然間發展起來，再度成為社會的焦點。

近年來，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的許多大公司為大幅降低產品成本，把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海外，在貧瘠的印度土地上綠洲般地建立起現代的跨國企業，這種外包(outsourcing)的經濟形式推動了印度中產階級的大規模產生。而經濟體制的改革則創造了更多機會，窮人愈來愈少，城市中產階級規模成倍增長。

印度獨立後的高等教育政策也促進了這個變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國家倡導下信息科技產業的發展。從印度國內看，軟件業已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發展極，1994-1999年印度信息產業部門的年長率超過44%，比同期全國國民經濟6.6%的增長率高得多，印度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軟件大國。軟件產業在這種強勁增長中起了帶頭作用，印度已建立起十七個軟件技術區，其中國家級軟件園區七個，註冊公司由1992年的142家發展到2000年的5,552家。在印度有195家軟件公司通過ISO9000認證<sup>②</sup>，這些措施使一部分人成為中產階級中的精英。

1994年，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開展題為「消費者階級」的研究，結果顯示：印度非常富裕的人有六百萬(相等於一百萬個家庭)，構成印度的上等社會。其下是兩個中產階級：上中產有1.5億人，他們可以批量購買各種耐用消費品；下中產是向上爬的一批，有

2.75億人<sup>③</sup>。西方商人過往一直把印度看作是有人口卻沒有消費者，但一夜間，中產階級變成了一筆財富，印度市場的一個重要符號和砝碼。

印度經濟自由化機器已經開動，而中產階級則是其發動機，他們對住房、汽車、彩電等物品開始表現出購買力。印度工廠能按世界的需求生產出更複雜的產品，印度中產階級也變得成熟，願意嘗試新的東西，敢於冒險。經濟學家、新德里一家諮詢公司的主任薩瑪(Sarma)這樣說<sup>④</sup>：

在過去的六個月中，我第一次為自己選擇不離開印度找到理由。在研究生畢業前，我有機會到美國，但最後我還是留了下來，我的親戚都說我犯傻了，但我現在覺得這裏是適合我的地方，而且會愈來愈好。

印度經濟的未來取決於印度中產階級的發展，中產階級愈多，就愈有可支配的貨幣來推動經濟發展，由此引起連鎖變化。

經濟自由化產生了社會真空，把過去和現代切斷，中產階級只作為消費階級存在，失去了它的其他特徵。在獨立後的很長時間內，印度的經濟政策是偏向窮人的，這種政策導向使窮人大大超過富人。印度人反思了這種社會經濟政策後認為<sup>⑤</sup>：

對印度失敗的測量不是印度的貧困程度，而是她沒有創造出中產階級。根據國家應用經濟研究委員會的資料，1984、85年少於人口的10%。現在是20%，如果國家在未來的經濟發展速度保持在7%，人口增長1.5%，文化程度提高，中產階級保持過去十五年的速度，在2020至2040年，一半的印度人會進入中產階級。當一半的印度人變成中產階級時，窮人的數量就相

1991年下半年印度開始經濟改革。近年來，許多發達國家的大公司把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海外，印度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軟件大國。一夜間，中產階級變成了一筆財富，印度市場的一個重要符號和砝碼。這種外包的經濟形式促使印度城市中產階級規模成倍發展。經濟自由化產生了社會真空，把過去和現代切斷，中產階級只作為消費階級存在，失去了它的其他特徵。

對減少，而且社會會有更多的辦法來幫助他們。因此關注中產階級就是關注繁榮，而不像我們過去關注貧困。這不是我們變得冷酷，相反，我們的目的是把貧困者拉入中產階級。

向自由主義進發，倡導消費主義，會造成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鴻溝，但這已經被官方認可和社會承認。許多印度人放棄了歷代相傳的經濟保守思想，開始冒險負債，成為信用卡用戶。1995年萬事達卡在印度的增長率高達106%，為亞太區之冠<sup>⑥</sup>。

對印度經濟持續發展的設想，促進人們思考印度的現實和可能的措施，但是擺在印度人眼前的不止一處的瓶頸卻讓人無法迴避。

教育投資是使生產力趕上經濟變革的重要策略，沒有人力資源，印度不會有長久的發展，儘管許多人為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勞動力市場和低工資而自豪，但印度工人卻因為素質低而缺乏生產率和競爭力，印度工人勞動增加值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是新加坡的四分之一。在基礎教育上的投資，韓國是每年人均138美元，馬來西亞是每年人均128美元，印度是每年人均9美元。印度教育部長考 (Maharaj Krishen Kaw) 在2001年對教育作出這樣的估計和期望：「我們計劃在2010年實現全民普及教育，重點放在基礎教育上，這是艱難的挑戰。」<sup>⑦</sup>

印度有39%的人口在貧困線下，35-40%的人不穩定地在貧困線上，按照實際生活水平，他們也是窮人。貧困阻止了五分之三的人掌握識字、算數等基本技能。在其他南亞國家，貧困人口的比例被國家針對性的政策控制住，印度尼西亞在82年是17%，馬來西亞在87年是14%，泰國在86年是26%<sup>⑧</sup>。印度的主要問題不僅在於

有着高比例的貧困人口，而且特權者認為貧困問題並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應該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這些想法是消滅貧困的最大障礙。

如果國家中只有一部分經濟力量處於活躍狀態，它不可能達到全面發展。對於印度中產階級來說，他們認為自己無須停止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只要改進追逐利潤的方式，窮人就會減少乃至消失。但印度社會似乎並沒有一套調節富人財富的策略。印度許多大公司不交稅，或通過行賄來逃稅，城市印度人交稅的比例只有2%。在稅收佔GDP的比率方面，1991年法國是38%，美國是34.1%，泰國18.9%，馬來西亞20%，而印度是11.5%，有意識地逃稅來避免承擔社會責任的做法遍及印度上等階級和中產階級。

印度「衛生」的調查數據排除了被剝奪者，自由化使印度富有者忽視窮人的苦難，新經濟政策強化了這種不敏感，貧富差異變得合法合理，公共意識的減弱成為印度的毒瘤。印度有三分之二勞力在農業，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在鄉村，儘管這些人的收入愈來愈少，但直選的票數是一樣的，他們可以用手投票來支持政府的改革，也可以用腳投票來拋棄造成貧富懸殊的政府。同時，由此引起的政治騷亂會摧毀中產階級加入富裕國家行列的夢想。

近年來，印度的上層精英開始重新找回社會道德、承擔社會責任。塔塔 (TISCO) 鋼鐵公司在私有化後，成立社會發展協會來幫助周圍村民，他們在六百多個村莊開展工作，解決灌溉與生活用水問題，改善農民的耕作飼養技術，修建校舍，促進鄉村實業，提高成人文化程度，鼓勵婦女參政，整治鄉村衛生環境。南新 (Ranbaxy) 製藥公司在1980年起就成立社區康復中心，開設五個流動站，

印度有39%人口在貧困線下，35-40%的人不穩定地在貧困線上。如果國家中只有一部分經濟力量處於活躍狀態，它不可能達到全面發展。印度的主要問題不僅在於有着高比例的貧困人口，而且特權者認為貧困問題並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應該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這些想法是消滅貧困的最大障礙。

近年來，印度上層精英開始重新找回社會道德，承擔社會責任。在60年代，中產階級隨着印度社會的變遷而變得退縮，失去理想主義信念。經濟改革後，他們汲汲於物質生活的追求。如果中產階級只追逐自身的狹隘利益，過着體面奢侈的生活，而對周圍大量骯髒、貧困、生病和缺少教育的同胞視而不見，這個國家是否能持續發展下去就值得懷疑了。

每個流動站駐有一位醫生、一位藥師和多名健康顧問，近十年來共診治逾百萬病人<sup>①②</sup>。

印度政府還說服了中產階級認同其人口計劃政策，中產階級已經把減少人口作為社會道德看待，兩孩之家是他們的普遍觀念。一位印度醫生說：「中產階級家庭只有一個孩子，要培養印度需要的孩子。如果一家有三個孩子，他們會感到尷尬。」<sup>③</sup>

政府應當採取措施鼓勵這些行為，使這些行為滲透到中產階級中。儘管慈善行為、人口控制並不是拯救印度的萬靈丹，但它可以激發中產階級的社會責任感，促進他們親和社會。這個過程將是長期的，並應該是印度政府和社會的長期戰略。

印度中產階級在1947年印度獨立後的十年堅守甘地與尼赫魯的遺產，精神振奮地參加印度復興的建設。到60年代，中產階級由於印度社會的變遷而變得退縮，因為集團內部的利益分割引起的紛爭，使他們日趨追逐自己的狹隘利益，失去理想主義信念。經濟改革後中產階級因為對國家經濟的貢獻而備受矚目，但對物質生活的無限度追求，使中產階級陷入了巨大的壓力中。印度和印度中產階級的未來尤其值得他們反思，如果中產階級只去追逐自身的狹隘利益，過着體面奢侈的生活，而對周圍大量骯髒、貧困、生病和缺少教育的同胞視而不見，這個國家是否能持續發展下去就值得懷疑了。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理念和現實，最終會造成階層的斷裂，戕害經濟的持續發展。印度十多年來的繁榮與中產階級的崛起有關聯，但中產階級是否可以用國家長期發展的代價換取自己的眼前利益，這既關乎印度的未來命運，也關乎印度中產階級的未來命運。

## 註釋

①②⑥⑩⑬⑭⑮ Pavan K. Varma, *The 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98), 1; 26-27; 166-67; 167; 171; 177; 191; 204-205.

③ 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 著，齊文譯：《印度的發現》(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

④ 《孟德爾報告》是以孟代爾 (B. P. Mandal) 為主席的「落後階級調查委員會」1977年做的一個調查，鑑於許多邊遠地區擁有一定勢力的社會經濟集團的下等種姓的要求，建議政府實現政治權利上(針對部分中產階級)的公正，吸取新的公職人員，在中央政府中給下等種姓留下27%的職位。

⑤ “The Poor Get Richer”, *Economist* 333, issue 7888 (5 November 1994).

⑦⑧ Siegfried Ramler, “The Educational and Social Divide”, *Independent School* 61, issue 1 (Fall 2001).

⑨ 曲恆昌：〈具特色的印度大學附屬制及其改革〉，《比較教育研究》，2002年第8期。

⑩ “India's Middle Class Splurges, Economy Sizzles” (<http://www.expressindia.com/fullstory.php?newsid=28291>).

⑪ 轉引自江春澤編：《國際經濟比較研究》(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2)，頁254。

⑫ 唐鎮樂：〈「軟件」強國——印度給我們的啟示〉，《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02年第6期，頁54。

⑬ Scott Baldauf, “Boom Splits India's Middle Clas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3 May 2004 (<http://csmonitor.com/2004/0513/p01s04-wosc.html>).

⑭ [www.theglobalist.com/DBWeb/StoryId.aspx?StoryId=2195](http://www.theglobalist.com/DBWeb/StoryId.aspx?StoryId=2195)

⑮ Tim Stafford, “India: A Success Story”, *Christianity Today* 38, issue 11.

張春明 南京財經大學法學院講師，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